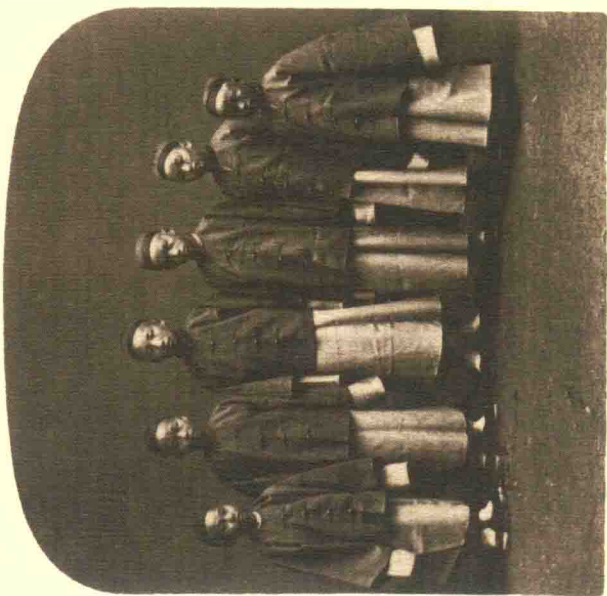


徐国琦 著 尤卫群 译



Chinese students' baseball team in Harford, 1878. (Thomas La Farge Papers, Manuscripts, Archives, and Special Collections, Washington State University Libraries.)

Chinese and Americans: A Shared History



Chinese boy students at the beginning of their journey. (Reproduced by permission of the Huntington Library, San Marino, California.)

中国人与美国人：一部共有的历史

Chinese and Americans: A Shared History

中国人与美国人：一部共有的历史

徐国琦 著 尤卫群 译

CHINESE AND AMERICANS: A Shared History

by Xu Guoqi

Copyright © 2014 by the President and Fellows of Harvard College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9

by Beijing Imaginist Time Culture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四川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 [进] 21-2019-27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人与美国人 / 徐国琦著；尤卫群译.

—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9.1

ISBN 978-7-220-10817-4

I. ①中… II. ①徐… ②尤… III. ①中美关系—国际关系史

IV. ①D829.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55199号

出版发行：四川人民出版社

地 址：成都槐树街2号

网 址：<http://www.scpph.com>

责任编辑：张春晓

特邀编辑：马希哲

装帧设计：陆智昌

内文制作：陈基胜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印刷

开本：965mm×635mm 1/16

印张：21 字数：265千字

2019年1月第1版 2019年1月第1次印刷

定价：7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为了人与书的相遇

谨以此书献给美茵、文歆和文虎

——他们代表了中国人和美国人最优秀的品德

序

这本书的副标题“一部共有的历史”^{*}，为我们提供了一把钥匙，它不但是徐国琦解读美中关系史的关键所在，而且指出了当今史学研究的一个重大发展方向。

徐国琦自己就是“共有的历史”精神的代表。他自1962年在安徽出生，就是中国历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后来他负笈美国求学，如今是一名杰出的历史学家，他的著作为中国和美国的歷史研究，实际上为整个世界的历史研究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他出生的村庄地处中国最贫穷的地区之一，那里直到1993年才正常通电。尽管他的父母都不识字，但国琦却是非同凡响的学生。1980年他被安徽师范大学录取，大学毕业后考入南开大学成为美国史专业的研究生。他的导师是杨生茂先生。杨生茂先生曾在1940年代在斯坦福大学师从托马斯·贝利(Thomas Bailey)。1987年徐国琦获得硕士学位。在获得哈佛—燕京学社奖学金到哈佛攻读博士之前，他曾在南开大学历史研究所任教。

1991年他开始在哈佛大学学习，我就是在那时第一次见到他的。

^{*} “Shared history”常被译成“共享的历史”，本书采用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系吴翎君教授的译法，见吴翎君《从徐国琦 Chinese and Americans: A Shared History 谈美国学界对中美关系史研究的新取径》，《台大历史学报》第55期（2015年6月），219—249页。特此致谢。——译注

他和许多外国学生一样，也包括我自己在内都曾有过同样的经历，那就是在最初开始学习的时候，英文口语和写作都不过关，特别是，他对于数十年间欧美历史学家在学术及文献研究方面的发展，对他们所取得的研究成果，都不甚了了，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很长一段时期几乎完全封闭了与国外学术界的联系。所以，徐国琦不仅要克服语言方面的困难，还要迅速跟上历史学界不断发展的学术研究步伐。可以说他在这两方面的努力都非常成功。

我们如今仍然能在他身上看到推动他成功的两个重要品质：毅力和执著。他在博士论文写作期间，是哈佛大学非常受欢迎的助教。1999年博士论文完成之后，他即任教于密歇根克拉马祖学院（Kalamazoo College），在那里一直工作到2009年，之后转赴香港大学任职。

在美期间，他将研究兴趣扩展到国际史，其中又以中美关系为侧重点。我相信，这对于他自己和学术界来说，都是十分令人欣慰的选择。美国史和中国近现代史都是他的看家领域，而且他一直是从小全球视野出发考察这些国家的历史。这些特点体现在他在很短的时间内接连出版的以下学术专著当中：《中国与大战——寻求新的国家认同与国际化》（*China and the Great War*, 2005）、《奥林匹克之梦——中国与体育，1895—2008》（*Olympic Dreams: China and Sports, 1895-2008*, 2008），以及《西线陌生客——一战中的华工》（*Strangers on the Western Front: Chinese Workers in the Great War*, 2011）。总的来说，这三本书都是建立在对欧洲、美国等多个国家和地区档案文献研究基础之上的学术专著，都是如何以“国际化视野”研究历史的典范。他的第一本书考察在国际化乃至寻求新的国家认同的过程中，作为这一进程的一部分，中国是如何于1917年加入到对抗德国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之中；第二部著作侧重于体育运动，追溯中国人对于国际体育赛事，特别是奥林匹克运动会坚定

不移地追求和积极参与；第三本专著叙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赴欧华工同欧洲人和美国人在欧洲战场共处，从而建立起千丝万缕的直接或间接的联系。

徐国琦的所有这些著作，包括以中文写作的专著及文章在内，都表明他在历史学家们将历史研究国际化的转变中，站在了最前列。不仅在研究单个国家的国别史领域，而且在研究不同民族国家之间交流互动的国际史领域，都是如此。根据传统，这一主题曾被“大国兴衰”的概念所涵盖，也即对不同国家根据其各自的大事记展开分析，通常用“国家利益”、“国家安全”、“力量均衡”这一类的词语来解读。这样的研究不可避免地倾向于以西方为中心，特别是偏重西欧和美国，世界上其余的国家和地区则主要是作为大国力量延伸和控制的对象而进入人们的视野。然而史学研究的国际史方法则是最大限度地将世界上尽可能多的国家和地区纳入研究范围。徐国琦的著作向人们展示应该如何运用国际史的研究方法，指出为什么以欧洲为中心书写近代国际关系在今天看来完全是不合时宜的。

同时，在国际史研究中，历史学家们已经将注意力越来越多地集中在个人及其所属的社团方面，而不是简单地侧重于政府和军队因素。在这个意义上，“国际”事务强调跨民族或跨社会的交流互动。在这一层面，重点在于不同的民族和非政府机构（如宗教团体、商业社团及各种文化机构）是怎样进行跨国界接触的。人际交往、团体之间的联系是弄清这些现象的关键，而在更为正式的国家间交往中，国家安全、领土完整和力量均衡则是政府的首要考量。换句话说，在一个层面的国际关系中人们假定国家之间存在分歧及潜在的冲突，而在另一个层面，国际关系实质上意味着无限的跨越全球的交往。

徐国琦的这本新作为上述第二个层面的研究做出了显著的贡献。这本书将焦点集中在中美两国民间的、个人的以及非政府机构

之间的互相交往和积极互动，而不是像许多同类著作那样只述及两国政府之间的官方往来。这本书从一开始就向人们展示，不管国与国之间的外交关系如何演变，都存在自成一体的各阶层交往，即非政府的交往，这一类互动自始至终都很活跃。这一点在教育领域尤其值得注意。中国的学生和老师被带到美国，美国则相应地将教育者和传教士送过太平洋。在这样的过程中所成就是共有的经历，之所以是共有的，是因为所有这些个人同接受他们的各个机构和学校之间建立了他们自己特定的关系。中国人和美国人可能都很在意各自在对方心目中的形象，他们对于未来也都产生出相互依存的发展愿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些特定关系有时会比实际存在的更“虚幻”和不可捉摸。

这一共有的历史并非中美所独具或是排他性的，它同样适用于中国人和美国人之外的世界。徐国琦正确地摒弃了文化决定论，这种文化决定论认定每个民族有其独特的文化传统，这些文化传统从来不会因为跨文化交往的存在而发生任何改变，始终如一。

这样的文化决定论在某些时候钳制了国际关系研究。然而，这里展现的共有的历史取代了文化决定论，并且会被亚太地区乃至全世界的许多人赞赏和推崇。所有历史都属于全人类。从来就不存在什么只为某一个国家及其人民所拥有而不被任何其他人所共有的历史。

所有历史必定都是共有的历史，但是这种共有的历史究竟如何形成，则需要翔实的研究论证。这本书就是这样的指点迷津之作。

入江昭
哈佛大学

致谢

在近三十年的时间里，关于如何理解中美关系史的问题一直吸引着我。1980年代我先是到南开大学攻读研究生，后来留校任教，从那时起开始认真思考这个问题。已故的杨生茂教授当年是我的导师，在他的指导下，我开始对这一专题进行系统性的学习，甚至将我的研究成果收录在杨先生主编的《美国外交政策史》一书中。1990年代我有幸来到哈佛大学，在传奇学者入江昭教授门下攻读博士学位。从文化和跨民族 / 跨国家的视角出发，入江教授彻底改变了我对中美关系及其历史的认识。哈佛大学毕业之后我来到密歇根州，任教于克拉马祖学院，在美国的腹地亲身观察体验美国文化、社会和政治，数年间收获极大。2009年，在美国生活、学习和工作了近二十年之后，我回到中国任教于香港大学，因而有了新的机会直接观察和研究中国政治和社会。多年来我一直想要根据我的学习和思考写一本有关中美关系的专著。在我已经完成的几本书中，如《中国与大战》、《奥林匹克之梦》，以及《一战中的华工》，读者轻易就可以找到我对中美关系思考的脉络。如今，在将近三十年之后，我终于将这本聚焦中美关系研究新视野的专著呈献在读者面前。我首先要感谢的，是我终生的导师入江昭教授和已故的杨生茂教授，是他们将我带入这一引人入胜的领域。入江教授在本书的写作过程

中给予了我无数的鼓励，并花费宝贵时间用心阅读整部手稿，给我提出极其宝贵睿智的建议和洞见。如果没有入江教授持续不断的大力支持和鼓励，这本书不可能完成。入江教授不仅带着宽宏的关爱为拙著作序，对这本小书褒奖有加，更重要的是，在他身上体现出一位真正的大师和导师的风范以及他对学生们的学术研究全心奉献的精神。无论就个人还是专业方面，没有人比入江教授对我的影响更深刻。我还要向哈佛大学出版社的编辑林赛水（Lindsay Waters）表示衷心的感谢，他不仅在几年前就鼓励我撰写这本书，并且耐心等待本书的完成，而且对我从未失去信心。他的助手王珊珊巧妙地使我的写作不偏离正轨，在我有问题和需要帮助的时候随时为我提供协助和指导。我要向在威斯特切斯特印刷服务公司（Westchester Publishing Services）的 John Donohue 及其团队表示由衷的感谢，感谢他们为本书所做的出色的排版编辑工作。

由于这本书是多年的思考、研究以及写作的积累，我无法记下所有更多在学术上有恩于我的机构和个人并逐一致谢。谨向为这本书的完成直接提供帮助的人们尽可能地表示特别的谢意：Ernest R. May 教授，我在哈佛大学就读时曾有幸受教于他，2008 年秋天，当我同他在其肯尼迪政府学院的办公室讨论这本书的细节时，他毫不掩饰对本书主题的极大兴趣和兴奋之情，并给予我许多极好的意见和鼓励，甚至提出在这本书完成之后为之作序。令人悲痛的是，没等我有机会呈现给他完成的书稿，他便于 2009 年不幸逝世。然而，他的深刻影响留在了本书的很多篇章之间。何复德（Chuck Hayford）和 Terre Fisher 不止一次通读了本书的手稿。何复德认真地审阅全部章节，并提出了很多尖锐的批评意见和深刻的建设性见解，以及非常宝贵和富有见地的建议，使得本书比较完善。为使我的思路和语言和谐统一，Terre 以她卓越的编辑组织才干使得最后的成书有了极大的改进，我对此永远心存感激。庄竞滔（Kendall

Johnson) 和 Barbara Keys 也分别仔细通读了手稿, 并提出许多深刻见解和意见。

Jay Winter 教授以及他在耶鲁大学的研究助手 Alice Kelly, 都热心回应我的求助, 为寻找耶鲁大学相关手稿和档案中的某些资料提供了及时和无价的帮助。多年的老朋友赵梅是北京《美国研究》杂志极富才华和见地的优秀主编, 因为她的鼓励, 我曾在 1980 年代末至 1990 年代中为《美国研究》写了几篇有关中美关系以及美国外交政策方面的文章。后来由于需要集中精力完成我的哈佛大学博士论文, 我不得不停止相关文章的写作。但如果没有赵梅博士督促我对有关问题继续进行思考, 写作本书的学术研究之火恐怕早已熄灭。

我还要感谢以下各位所提供的特别帮助: 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的林希文 (Raymond Lum) 在他的工作范围之外帮助我搜寻档案资料。哈特福德高中档案馆的 R. J. Luke Williams 花费很多时间同我一起查询珍贵的馆藏, 甚至同我分享他自己所写的相关文章。台北“中央研究院”胡适纪念馆的潘光哲馆长在我查询图书档案时, 特别准许我查阅图书馆内很多尚未公开的资料。吴翎君也为我搜寻档案资料提供了大量帮助, 并同我分享对中美关系的共同兴趣。路康乐 (Edward J. M. Rhoads) 准许我阅读他当时尚未出版的关于清代留美幼童研究的书稿, 石约翰 (John E. Schrecker) 特别给我看他的有关蒲安臣研究的资料, 并且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花费了许多时间就我们共同的研究兴趣展开讨论。我的三位出色的研究助手同为哈佛大学学生: Michael Chang、Lily (Jiali) Zhu 和 Chen Yichen, 他们都为我的研究提供了我所需要的帮助。Hajo Frolich 也为我提供了许多及时的帮助。

很多学校和机构都为这本书的完成提供了极大的帮助。在香港大学, 我有幸同许多关心、支持和慷慨帮助我的人一起工作, 真是

莫大的福分。我对我的历史系同事们给予的支持表示最热忱的感谢，感谢文学学院院长雷金庆（Kam Louie）和行政院长沈德祥（Edward Shen），无论何时，他们都在我需要的时候一如既往地给予我支持和帮助。感谢香港大学文学院的查良镛学术基金会（Louis Cha Fund）和徐朗星研究基金会（Hsu Long-Sing Research Fund）的慷慨资助。香港大学所提供的基础研究资助，并给我急需的学术研究假，是使我的研究和从事本书写作不受太大干扰的关键。我还要向哈佛大学瑞德克利夫高级研究院（Radcliffe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表示由衷的谢忱，在本书立项之初，我曾于2008—2009年间作为驻院研究员在那里进行研究写作，研究院不仅提供了一个激励我思考和大有收获的环境，使我能够快速启动写作本书的项目，还为此向我提供了几位非常胜任的助手。2013年夏，研究院让我重新返回，允许我在那里对已经完成的书稿进行最后润色。我也非常感谢剑桥大学的Hughes Hall学院，通过多丽丝·施文香港大学—剑桥大学Hughes Hall基金（Doris Zimmern HKU-Cambridge Hughes Hall fellowship）的支持，我得以在剑桥大学美丽的校园从事这本书的研究写作，在那里度过了一段收获丰硕的时光。

许多图书馆和档案馆都使我受益巨大。除了我所在的香港大学的图书馆提供那些极有价值的馆藏之外，下列图书馆为我查阅其珍贵的资料收藏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哈佛大学档案馆和图书馆，耶鲁大学手稿图书馆和档案馆、英国国家档案馆、大英图书馆、康涅狄格历史协会、哥伦比亚大学善本书及手稿图书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档案馆、亨廷顿图书馆，华盛顿州立大学特殊馆藏部、美国国家档案馆、吉米·卡特总统图书馆、理查德·尼克松总统图书馆、约翰·肯尼迪总统图书馆、杰拉德·福特总统图书馆、美国国会图书馆手稿部、北京国家图书馆、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台北“中央研究院”胡适纪念馆藏书资料库、

基督教青年会档案馆 (YMCA Archive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Minneapolis)、本特利历史图书馆 (Bentley Historical Library, University of Michigan, Ann Arbor)、哈特福德高中档案馆、圣三一学院伯克利图书馆, 都柏林大学学院詹姆斯·乔伊斯图书馆、柏林德国外交部历史档案馆、巴黎法国外交部档案馆等。本书的完成离不开以上所有个人和机构的帮助, 但书中若留有任何事实上的出入或解释上的错误, 责任当由作者本人独自承担。

在所有这一切之上, 我最深深感激的人是我的妻子尤卫群, 她的理解和奉献精神使她全力在各方面支持和帮助我的工作。我的三个孩子美茵、文歆和文虎都给了我很多鼓励和支持。他们继承了中国文化传统而成长于美国, 是中国人和美国人的最好代表。我带着对他们的爱和羡慕将这本书献给他们, 希望通过他们以及其他很多人的努力, 未来的中美关系将会享有更多的合作互利, 有共同的价值观及对未来的展望, 而冲突和误解将会越来越少。

目 录

导言 中国人和美国人之间非同寻常的共有历史 / 001

19 世纪的使者

第一章 蒲安臣——中国派往世界的第一位使节 / 025

第二章 中国第一批留学生——19 世纪的清代留美幼童 / 075

第三章 戈鲲化：美国第一位汉语教师 / 107

国际化中的中国和美国

第四章 古德诺：中国的美国顾问 / 143

第五章 约翰·杜威：洋孔子兼文化大使 / 211

大众文化与中美关系

第六章 由体育运动而产生的共有外交旅程 / 243

结 语 / 269

注 释 / 275

参考文献 / 301

索 引 / 311

导言

中国人和美国人之间非同寻常的共有历史

在为自由而战的革命中诞生的美利坚，是一个年轻的国 1
家……但我们的宪法却是全世界延续使用的最老的成文宪法。中华
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然而作为现代国家，中国却很年
轻。我们可以互相学习。

——吉米·卡特

2008年8月8日是北京选定的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的日子，就在这一天，美国总统乔治·布什（George W. Bush）参加了美国驻北京大使馆新馆大楼——“新时代之新使馆”¹的落成使用揭幕典礼。中国人和美国人都特别愿意选择这一幸运的日子来开启新纪元。为了纪念新馆的启用，美国国务院就中美两国之间悠久的历史交往特别编辑出版了一本印刷精美、图文并茂的纪念册。这本书的英文版和中文版几乎同时发行。书的名字为《共同的旅程：中美两百年史》（*A Journey Shared: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Two Hundred Years of History*）。遗憾的是，这本只有短短64页的书乏善可陈，即便被冠以如此立意高远的书名，充其量也只是一般的外交史大事记，遗漏了真正的共同旅程之中那些关键落脚点。正是由于这些严重缺陷，历史学家易社强（John Israel）将这本书称为“咖啡桌上的读物”。²

如果说在这里美国国务院颇有失误，那么多年的学术研究中也存在同样的问题。以传统视角研究中美关系似乎有两个致命缺陷：第一，这些研究通常以美国和美国人为着眼点，只把中国人简单地作为对西方所进行的各项活动及行为的被动反应者来描述。很少有人给中国人率先做出的乃至改变中美关系的行为予以同等程度的重视。第二，这些研究通常设定一种自上而下的方法，过分强调政府部门、政治家和经济方面的作用，而轻视和忽略个人因素，特别是那些中国人和美国人合作发起、共同积极参与其中的活动和经历，例如体育运动这样的大众文化。读者可以随便拿起一本中美关系史通论，里面对本书所涉及的个案几乎看不到任何认真的探讨。这种传统研究方法无法提供完整的历史画面，但是只有在完整的历史画面中，中国人和美国人才会被同等聚焦，才能显示出他们为加深相